

# 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

童舜尧

(宁波大红鹰学院社科部,宁波,315715)

**摘要:**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是十分激烈的,它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前后经历过攻守互换的两个阶段。与中共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相比,它又有自己的特色,如货币共存而非货币独占、发行金库兑换券等。中共浙东抗日民主政府是通过一系列手段,最终夺回货币战争的主导权。这些手段包括狠抓货币信用、减免赋税、多种斗争配合、信贷服务等。通过货币战争的锻炼,根据地既实现了金融稳定,生产发展,还培养、锻炼了一大批金融干部。他们的斗争经验,为解放战争时期财经工作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关键词:**浙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战争;金库兑换券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16)03-0286-06 **引用页码:** 060501

“经济的斗争,这表现的最尖锐的是货币的斗争。”<sup>[1]692</sup>1941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经过4年多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华中新四军终于建立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由浦东、会稽、四明、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四区组成,人口400多万,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虽然在中共的19块抗日根据地中,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较晚,但地处中国富庶的沪杭甬三角地区,横跨杭州湾两岸,扼控中国最繁忙的海运通道,一直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敌我之间,货币的排挤与反排挤之争异常激烈。日伪政权发行的伪币、国民政府的法币与中共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抗币,都想在浙东地区赢得本位币的地位。三方斗争激烈又复杂,既排挤又联合,斗争又包容。研究抗战时期的浙东货币战,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 一、有关浙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战争需厘清的问题

厘清问题是要说明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特点,了解这些特质更能接近历史的本相。需要厘清的问题主要有三:

(一)浙东抗日根据地货币发行种类的多样性需

重视。以往对浙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战的研究,关注焦点多集中在浙东银行及其发行的抗币上。其实浙东银行成立前(1945年4月),浙东抗日民主政府发行过一些货币,比如金库兑换券和一些县区地方币。货币战争早在浙东银行成立前就已经打响,金库兑换券与浙东地方币在货币战争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不能把焦点只集中在浙东银行。况且浙东银行币主要在四明和三北地区流通,金库兑换券流通却遍及浙东抗日根据地各县,由此我们必须突出金库兑换券在浙东货币战的地位与作用。

(二)金库兑换券是否具有货币战实体地位。毕竟它只是提取现金的证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体货币。然而中共浙东各区县的地方币与浙东银行币使用时间并不长,最短的二十几天,最长的不到半年。只有金库兑换券使用时间最长,将近三年,从面世起就置身于货币战争的最前线,还被浙东军民当做实体货币使用过。原浙东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陆慕云在回忆录中就说,“(它)为社会所信用,逐渐流通于市场”,“有一些金库兑换券被当地政府明令缴粮纳税,一律通用”<sup>[2]</sup>,它完成了“调剂金融市场,发展社会经济,充实抗战力量”<sup>[3]495</sup>三大任务。所以,

金库兑换券同时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属性,有交换职能。章均立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一文中指出:1941年5月至1945年1月是抗币初创阶段,“该阶段的主要成就是金库兑换券的产生”<sup>[4]162</sup>。所以,我们不能用严格定义上的货币名称,去设定浙东货币战的历史框架。

(三)有关共性与个性的问题,即中共19块抗日根据地在货币发行上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各自特色。有关中共抗日根据地货币战争的研究,以往学者关注重点多集中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地区,且共性研究居多。似乎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走的都是同一个模式(即货币独占),遵循着同一个结果(即根据地货币大获全胜)。事实上,这19块根据地在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各根据地的个性,未必与共性一致。恰恰这些个性,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却被研究者忽视。就货币战争来说,浙东抗日根据地坚持的就是“货币共存”的模式,没有“货币独占发行”,抗币虽取得了货币战争的主动权,但直至日本战败投降,伪币依然还在部分地区流通。所以,关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能丰富、完善对中共抗战时期经济工作的研究。

## 二、浙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战争的历史背景

浙东沦陷后,日伪钞票便开始泛滥。后来南京汪伪政府发行中储券,成立所谓的中央储备银行在浙东多地大设办事机构,为他们掠夺战略物资服务。他们牢牢控制了浙东地区的金融市场。中共浙东党委负责人也认识到,“解放区之金融完全为伪币所控制,这是当时浙东工作中最重要的弱点之一”<sup>[3]501</sup>。伪币贬值给根据地财经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因为“我们的收入是谷子作基准的,谷子价格上涨不能达到日用品上涨的水平线……在当前的财政开支上,收支是不能平衡,造成目前的财政困难”<sup>[5]35</sup>。伪币不除,根据地永无宁日。

金库兑换券与浙东银行发行的抗币,是浙东抗日民主政权承担货币战争的主要币种,两者发行面对着同样的金融形势。一是伪币滥发让浙东百姓身受其苦;二是国民政府法币的信用低下,统治不得人心。比如在浦东横行的国民党别动军,他们“凭其正统合法,收捐收税,敲诈勒索……浦东人民号称他们为游吃队”<sup>[5]90</sup>,如此行径让浙东百姓对法币岂有好感。1945年5月21日的《新浙东报》(中共浙东党委的机关报)有报道,“100斤谷价,1944年5月为中储券840元,9月为5000元,11月为7000元”<sup>[6]</sup>,谷价半年时

间涨了9倍,金融市场极度混乱。所以,稳定金融事关人心向背,是中共能否在浙东立足的关键问题。

发行金库兑换券的历史背景有二:其一,伪币对法币的排挤,造成浙东经济命脉的三北地区“法币收尽,别无流通之货币用以抵制伪币,于是我三北经委会于1943年发行了金库兑换券……在根据地内流通使用”<sup>[5]28</sup>。其二,是出于安全考虑。由于敌我交错,战斗频繁,要“解送大量现金,长途往返,是十分危险的。考虑到这一情况,总部发印给各单位、各部队一定数量的金库券,并规定,凭金库兑换券向当地税务机关、县财经科提取相应数量的现金,再由各税务机关、县财经科将金库券汇集,抵作现金解入金库”<sup>[4]87</sup>。金库兑换券原本只是兑换现金的凭证,但由于浙东人民厌弃伪币、法币,而金库兑换券信用稳定,逐渐被浙东百姓接受,“调度库款,便利划拨,并间接使金融周转更臻灵活”<sup>[4]163</sup>。此外,浙东一些区县发行的地方币,存在时间短,做工粗糙,加大了百姓选择金库兑换券的意愿。

抗币的发行,也是要打破伪币对浙东金融的控制。金库兑换券虽好,但它发行量小,又只能在根据地内流通,面对大宗商品交易有心无力,与域外的物资交流也使用不上。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也不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本位币。一些信贷业务没法开展,投资开厂也受限制。加之地区不同其价值尺度也不同。所以,面对伪币的侵扰,各地各自为战,金库兑换券始终处于劣势。《区委关于发行抗币与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的指示》提到,“货币斗争上,至今没有很好的开始,我解放区的金融完全为伪币所控制,这是当前浙东工作中最重要的弱点之一……抗币之发行已成为全体军民热切希望与迫不及待的任务之一”;“1945年1月的浙东各界临时代表会议上,四明地区的代表……提出了建立金融机构,发行抗币的经济提案……四月一日,浙东行政公署公布了《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和《浙东银行条例》”<sup>[5]36-37</sup>。统一金融,成为中共在浙东货币战中打翻身战的重要条件之一。

## 三、浙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战争的主要阶段与表现形式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敌攻我守,从1943年初至1945年4月,金库兑换券和各区、县的地方币担纲主力。后阶段敌退我攻,从1945年4月至8月,是夺回货币战主动权的阶段,其功臣是浙东银行发行的抗币。两阶段相辅

相成,前阶段是后阶段的基础,后阶段是前阶段发展的最终方向。虽然两阶段参与货币战的主体不同,但强化中共在浙东地区经济主导权的目标是一致的。

具体来说,抗战时期浙东货币战的表现形式有如下四种:

(一)伪币排挤法币,这是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生死较量,具有和全国一样的共性。1939年,日伪华兴银行发行了总数为500万元的华兴券,流通区域以苏皖浙三省为主<sup>[7]</sup>。1941年1月,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后,发行中储券,开始全面打压法币。如必须用中储券纳税,降低法币的兑换比值,严惩收藏法币者。1942年6月22日,汪伪利用中储券在沦陷区内吸收法币12亿元以上<sup>[7]</sup>。通过套取法币,再投放到根据地来攫取物资,是汪伪常用的手段。据《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略述》一文记载,“敌伪并强以伪币与法币一作二之比,自抬其价值,滥发伪币,致百物腾贵,民不聊生”,造成“三北地区法币收尽,别无流通之货币用以抵制伪币”<sup>[5]28</sup>的局面。汪伪政权对付法币还有一种手段,即伪造法币,扰乱金融市场。据统计,抗战期间日伪伪造法币总数达到40亿元<sup>[7]</sup>。因此,遏制伪造法币流入,是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经济措施之一。

(二)抗币对法币联合与限制,是国共合作的需要。在《我党我军在浙东地区今后的一般任务》中指出对于国民党“我们还必须照顾其利益,实行某些经济上的让步”<sup>[8]275</sup>。即便浙东银行成立后,中共华中局还强调“抗币发行后,应联合法币在基本区坚决打击伪币”<sup>[8]282</sup>的方针。再者,想要完全禁止法币在域内流通是不现实的,况且浙东地区工商业较发达,域内工商业者与域外的生意往来需要使用法币。另外,联合也有利于团结民族资本家和一些地方绅士来支持抗日。

限制法币是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抵消法币贬值的恶果。陆慕云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一文中,谈到抗币与法币既合作又独立的关系,即“抗币发行后应确定它是抗日政府的本位货币……应按各自的客观条件确定抗币与法币的比价……抗币即使不提价也可不完全受法币伪币膨胀而带来的损失”<sup>[4]92</sup>。金库兑换券原本是兑换法币的。只是后来浙东银行发行的抗币,日益成为根据地本位货币,为降低法币贬值的风险,它才开始兑换抗币。《浙东抗币初探》一文指出,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加盖“本币兑换抗币拾圆”金库兑换券的发行时间应在1945年4月—5月<sup>[2]</sup>。

(三)抗币对伪币的排挤,是中共应对货币战争的主要环节。伪币贬值、物价飞涨,不利根据地金融工作的开展。曾经在三北经济委员会工作过的叶伍同志,在《三北地区税收工作的五年战斗》一文中写到“税收增加,伪币贬值,收入的伪币激增。由于形势恶劣,税款上缴金库不能像以前那样两三天缴一次,而是十天、半个月才向三北金库送一次款……以后款数多了,要人挑,得派武装人员去送……由于伪币数量多,每次得派一个班的武装人员护送十来个人挑的款去金库才行”<sup>[5]67</sup>。所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有效贯彻实施,改善民众生活,就必须排挤伪币,打破汪伪经济封锁。

(四)伪币对抗币的排挤。汪伪政权用政治高压来保证伪币流通,排挤其他货币。在其占领区一旦发现其他货币,必将严惩。浙东新四军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就遭遇一些商家、店铺怕报复,不敢使用根据地货币。物资封锁也是汪伪政府常用手段,特别是造币专用的富士纸与印刷设备更是封锁的重点。富士纸体积大、份量重,要通过敌人封锁线很困难,这给根据地的货币发行带来不小的障碍。

汪伪政权也伪造根据地货币。《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第九条规定,“凡有伪造及其他破坏抗币行为者,依照刑法从重处之,其有汉奸嫌疑者,并依惩治汉奸条例办理”<sup>[4]39</sup>。此规定,显然是针对汪伪政府的。汪伪政权还用迫害根据地金融干部的手段,来变相排挤根据地货币。金融干部的损失对根据地的负面影响都很大,既有钱款损失(由于农村印刷条件差和敌伪对纸张封锁,根据地货币一旦被毁,很难弥补),更有经济人才的断层与财经工作的搁置。三北经济委员会中区分会主任杨定牺牲后,“其职务一直空着,没有人来接任”<sup>[5]74</sup>,导致伪币一度在三北地区猖獗。

#### 四、中共浙东党委应对货币战争的主要手段

战斗的频繁,敌人的封锁,加上浙东抗日民主政府支出庞大(仅1944年4月支出就达34200万元整<sup>[4]88</sup>),根据地陷入财政困难,百姓生活大受影响。所以,排挤伪币,稳定金融秩序,势在必行。排挤伪币的斗争手段主要有:

(一)减免赋税,征粮征税优先使用代金。“减租减息”是中共赢得浙东民心的重要举措之一。浙东抗日政府征收的税额仅为日伪征收各种捐税的1/5<sup>[5]93</sup>。该政策使“广大农民认识到我党和我军维护农民的利益,因而愿意向我们交公粮……各地征粮工作比较顺

利,1944年秋收后,四明地区在3个月内完成征粮任务600万斤”。至于税收部分,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征统一的进出口货物税和盐税,货物实行一物一税制,过境交一道税,尔后可以在根据地内通行无阻……国民党政府和伪军是各自为政,一个单位设一个卡,征的是步步税,客商们吃尽苦头,而我们税收政策受到客商的普遍欢迎,主动来税卡纳税”<sup>[9]212-213</sup>。税收杠杆成为冲破敌人物资封锁的有利武器,既有利货币流通,还让优先使用代金的政策得到落实。

(二)狠抓根据地货币的信用。浙东民众厌恶法币、伪币,根本在于信用问题,即发行“没有硬通货与相应物资的保障”<sup>[10]342</sup>,随意而为,钱不值钱。中共对货币发行相当重视,早在1938年8月,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在对晋察冀边区银行的指示中就强调“边区要有比较稳定的货币……边区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边区的纸币应有准备金,特别要以工业品等货物为第一位”<sup>[11]</sup>。浙东行政公署发行货币,严格遵照了中央指示。只是第一位的货物不是工业品,是粮食,即根据地货币的信用始终跟当地产粮数量挂钩,币值与粮食斤两的比值基本保持不变。

比如新四军金萧支队发行的金库兑换券,都有“本兑换券每拾元值食米壹斤,本兑换券以田赋公粮为准备金”<sup>[2]</sup>的印章,明确兑换券的价值尺度和发行基础。当然,不同单位发行金库兑换券的价值尺度是有差异的,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在1945年3月7号的布告中指出,他们发行的金库兑换券执行拾圆抵米十斤的标准。虽然标准不同,但是信用与粮价挂钩是始终如一的。

再者,抗币发行额度的原则问题,中共华中局在回复浙东行政公署有关发行抗币请示的电文中指出“应按照自己的客观条件,确定抗币与法币的比价,比价不宜太低……原则上应以根据地几种主要的农副产品物价的加权指数为标准”;“抗币与法币比价确定后,再确定发行票面的大小与发行数量”。根据指示,浙东行政公署决定,“发行的抗币总数定为200万元,等于粮食100万公斤的价值,作为浙东银行的基金”<sup>[4]92</sup>。之所以敢定200万元,在于浙东行政公署握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仅梁弄粮站统计,“1944年7月到1945年6月的一年中,进出的粮食达500万斤”<sup>[5]53</sup>,为货币发行提供了足够的安全与信用保障,因此浙东抗币从未出现过挤兑风险。由于币值稳定,还能规避伪币、法币贬值的风险,深受群众欢迎。甚至还被当成坑币(坑即储藏)被百姓储

藏起来,当时浙东民间就流传有“藏抗币不吃亏”<sup>[12]351</sup>的说法。

### (三)货币斗争与贸易斗争、军事斗争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中共中央强调发行货币,“要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为货币政策的后盾”<sup>[11]</sup>。物价稳定需要货畅其流。贸易畅通能稳定币值、抑制通货膨胀。“发行抗币后,必须同时开展贸易管理”,而且“抗币作为金融力量,联合法币,打击伪币,使财经工作同军事结合起来,发挥了较好的作用”<sup>[4]93</sup>。用税收杠杆调节是保证贸易顺畅的好办法。浙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一物一税制,税率低,有效地打破了敌人封锁,保证了根据地贸易的顺畅。

经济战争是需要各部门配合的,毕竟浙东域内大点的市镇大多被伪军控制,反动派对根据地货币会千方百计加以破坏。而且“管理金融贸易财政及各种经济建设事业是我们干部最缺乏经验的一个工作部门……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复杂的……这决不是财政部门同志单独所能解决的问题,而必须我党政军民各部门同志通力合作,密切配合,才能取得这一斗争的完全胜利”<sup>[12]161</sup>。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也多次强调“财经工作与军事工作有机结合起来”<sup>[9]216</sup>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中浦东地区财经工作》一文提到,“浦东是温州、浙东、苏北、山东的海运中心……我海防大队曾于1942年,设卡于六灶港、小洼港一带……运往浙东、苏北解放区的军需品一律免税……奢侈品课重税,资敌物资充公没收”<sup>[5]98</sup>。该资料指明贸易、军事、税收三位一体,在浙东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中成为一种常态。同时,根据地货币发行额度又和粮食挂钩,就得牢牢掌握粮食的控制权。所以反抢粮、保秋收工作,意义重大,是根据地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的双重需要。再有,应对国民党的经济破坏也要讲军事斗争。比如《开辟虞北区》一文提到,国民党CC系的丁坚擅自加大派粮派款数额,污蔑抗日游击队是非法组织,杀害爱国民众沈正义。对此,中共虞北区委用武力铲除顽固分子,使得丁坚再也不敢来虞北派粮派款。

### (四)坚持群众路线与信贷支持两手抓

浙东抗日根据地是华中抗日的东南前哨,全盛时期新四军也有一万五千余人。要生存发展,必须紧紧依靠群众才行。

1. 群众是粮食安全的主心骨。激发群众的生产热情,能让群众自觉成为反抢粮、保秋收运动的主

力。1943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有《浙东余姚等县民众反抢粮斗争如火如荼,军民配合夺回粮食数十万斤》的报道<sup>[5]29</sup>。1944年9月,余姚南乡3000民众配合当地自卫队,一次夺回被抢粮食10多万斤<sup>[13]145</sup>。只要粮食越多,货币发行就越有保证。群众性的反抢粮斗争,是经济工作与军事工作相配合的典范。如1943年四明山区爆发春荒,一些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米价。中共姚南县委征得上级同意后,立刻平价抛售十万斤大米,帮灾民渡过春荒,稳定了市场。抗战胜利后,浙东新四军奉命北撤时,回收了抗币。回收工作的顺利完成,也得益于对粮食的控制,仅梁弄粮站“在九月份就售出大米二万六千一百斤,收回抗币三万五千元”<sup>[5]54</sup>。“以粮换币”政策维护了浙东百姓的利益,而货币能发能收,社会秩序不乱,说明中共浙东区党委对货币的干预能力到了娴熟的地步。

2. 货币发行以服务生产为要务。光做价值尺度的文章不够,还要在信贷方面让群众满意。信贷也是货币信用的体现,在货币发行上“要尽可能采取群众路线……贷款时要切实注意:要贷给有组织的基本群众,以刺激群众参加组织,同时也要真正贷到基本群众手中,照顾基本工农群众,避免富农路线”<sup>[4]93</sup>。1945年4月2日,《新浙东报》报导了“四明专署分配春贷一千万”<sup>[14]28</sup>的事情。4月20日的《新浙东报》报导了南山县左溪乡在笋价大跌时,政府给予贷款,帮助笋民成立合作社,煮咸笋、晒笋干出售的事情,笋民大受其益,他们说“不是成立合作社和贷款,今年的笋价一定要跌到不可收拾的地步”<sup>[6]</sup>。有了贷款,群众生产积极性高了,自然会去排斥伪币。

3. 做好投资理财,规避伪币、法币贬值风险,也要依靠群众。曾经担任浦东海防大队政委的何亦达同志回忆,“救国公粮的征收,年征约3—4千石米的代金,这些放着是要贬值的……工商业者王家杰,他拥护抗日,支持子女参加我军,他敢冒风险,为我们代购西药和各类军需品,他还为我军代买了横河大新厂的股票,并设法安置了一名我军人员,驻厂收集情报”<sup>[5]97-98</sup>,使浙东新四军获得了比较可观的投资收益,这些收益又能购买更多的物资商品,进一步刺激根据地代金的发行规模。

走群众路线,让中共在浙东货币战中获得无尽的源泉。根据地人民开始自觉抵制使用伪币的商铺,并向店家做思想工作,晓以民族大义,使伪币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共赢得货币战争主动权的根本。曾经担任大岚

区抗日自卫中队中队长的王援军同志在《大岚区财经工作概况》一文中提到,大岚区原先是伪币猖獗的重灾区,经过抗日军民的不懈努力,出现了“抗币自发行以来……很快把伪币和法币挤了出去,抗币成为大岚区根据地主要流通货币”<sup>[5]86</sup>的局面。

## 五、结 语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经历过敌我攻守易位的两个阶段,期间中共浙东区党委有过主动出击,即先后执行过打八折收用伪币和伪币一律以对折计算的措施<sup>[5]28</sup>,只是收效有限。货币攻守双方的变化,反映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有着不同于中共其他根据地的特色。这既有地缘上的因素,也受本身抗日力量强弱的制约。在晋察冀边区,伪币一直是非法的,禁止在边区流通,就是国民政府的法币也在禁用之列。晋察冀边区货币政策的强势,与当地中共抗日力量相对强大,又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有关。浙东抗日根据地两无其一,又深处日伪势力的心脏地带,必然在与伪币的斗争中处于长期的守势地位。金库兑换券的使用,是浙东根据地的特色,因为“至今尚未发现别的抗日根据地发行金库兑换券的文献记载和流传下来的实物”<sup>[4]164</sup>。这是务实的选择,又是累积浙东抗日力量的必然步骤。

“货币发行的目标是什么?是独占还是与其他货币共存?这是货币发行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不论是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还是苏北和山东抗日根据地,争取(货币)独占发行的斗争向来都是主要目标”<sup>[15]</sup>。然而,在浙东抗日根据地走的是货币共存的路,即便浙东银行发行抗币,走的也是“联合法币,排挤伪币”的政策。为此浙东抗日根据地还多出一个如何应对法币信用危机的问题。晋察冀边区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保证边币的独占地位,鼓励民众将法币兑换成边币,否则“一经查获(持有法币),一律没收一半”<sup>[1]649</sup>。浙东百姓对根据地货币的选择,则在于它币值稳定。当地政府也讲政治斗争,但主要靠利用价值规律,进行市场调节的经济手段来引导群众的选择。

中共浙东区党委能在货币战争中化被动为主动,这告诉了我们三个浅显的道理,即货币的发行不能以牺牲基本信用为代价;信贷要给真正需要的个人和企业;货币发行目的是发展生产,而不是作为敛财手段来运用。这三点的核心是货币信用,发展生产与信贷都是为提高信用服务的,而货币信用的取得不能靠货币贬值来实现。当日本把数十亿伪造法

币投入中国市场时,重庆国民政府想到的是开动印钞机,主动制造通货膨胀,让假法币淹没在真法币的“汪洋大海”里,其结果反而让自己深陷货币信用危机的泥潭,直至国民党败退大陆时也解决不了,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三个道理以人民利益为依归,增强了民众对抗日民主政府的信赖。1945年5月23日的《新浙东报》刊文指出,“(人们相信)民主政府的钞票出来了,证明敌人将亡,天快亮了”<sup>[6]</sup>。

纵观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实际反映的是根据地军民如何应对伪币霸权的问题,包括伪币贬值给根据地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该怎么解决、法币的信用危机要如何应付、信贷与税收杠杆怎么运用等等。70多年后,我们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当我们潜心研究诸如美元霸权、美元的量化宽松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欧元区扩张、人民币国际化、金融综合改革试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等课题时,可曾想过类似的问题当年浙东根据地军民都遇到过,还很好解决了。他们的解决方案,比如稳定币值、金融创新、服务实体、保障生产、发行有序、注重投资、贸易自由、利用规律、市场调节、政策多元、多管齐下等等,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当今中国依然面临着来自货币金融领域的挑战,人民币贬值与升值的双重压力依然存在,我们只有将历史经验总结好、学习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 参考文献:

[1]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河北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 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

- 期:财政金融[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 [2] 黄成. 浙东抗币初探[J]. 浙江金融,1987(S1):95-109.
- [3] 浙江省档案馆. 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 [4] 宁波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卷六[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 [5] 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余姚市新四军研究会,慈溪市新四军研究会. 浙东抗日根据地财经后勤卫生专辑[M]. 杭州: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文印中心,1999.
- [6] 黄成. 试论浙东抗币的历史地位[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9):43-51.
- [7] 郭静洲. 华北、华中地区的中日货币战[J]. 东南文化,1995(3):83-86.
- [8] 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浙东抗日根据地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 [9] 谭启龙. 谭启龙回忆录建国前部分[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 [10] 董贻安. 浙东文化论丛[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 [11] 孔祥毅. 一路坎坷一路凯歌: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J]. 中国金融,2008(18):17-18.
- [12] 浙江省档案馆等. 浙东抗日根据地[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 [13] 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浙东抗日根据地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 [14] 宁波新四军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卷五[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 [15] 汪澄清. 货币之战:论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稳定政策[J]. 中共党史研究,2005(6):40-45.

## Study on Currency War of Zhe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TONG Shun Yao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Ningbo Dahongying University, Ningbo 315715,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cy war was very fierce in Zhe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It mainly involved four kinds of performance forms and experienced two stages. Compared with currency war in other anti-Japanese bases, i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currency co-existence policy rather than currency monopoly and issuing treasury exchange voucher. Through a series of means, the Zhedong democratic government eventually regained the dominance in the currency war. These measures include: pay close attention to monetary credit, tax relief, a variety of combats and credit services, etc.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currency war, Zhedong base not only achieved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but also trained a large number of financial cadres. Their fighting experience laid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work in the period of Liberation war.

**Key words:** Zhe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currency issue; treasury exchange voucher

(责任编辑:王艳娟)